

# 理论缝合、文本勘探与多元对话

□ 庞 弘

《“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毛娟著，商务印书馆，2016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已越发深刻地弥散于包括文学艺术、都市景观、流行时尚、娱乐休闲、装帧设计在内的诸多领域。相应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也已成为最引人关切的学术命题。围绕“何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何为”“后现代主义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德勒兹（Gilles Deleuze）、桑塔格（Susan Sontag）、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一大批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和视域出发，展开了激烈而不乏洞见的讨论。虽然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内涵和本体特征尚存在种

种争议，但必须承认，对后现代主义的追问、思考与探究几乎已融入了当代学术话语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学者毛娟的新作《“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下文简称《“沉默”与“多元”》）以后现代主义最早的考察者之一、美国文艺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为关注焦点，在理清相关文化背景和代表性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从理论操演与批评实践的双重向度出发，对哈桑的后现代文艺观展开了全面、透彻的解读。上述研究不仅使哈桑这位在中国理论界稍显“陌生”的思想家进入了更多人的视域，同时也有效推进了国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文艺批评的理

解、体认与反思。

作为沉潜多年而成的学术论著,《“沉默”与“多元”》一书中最见功力之处在于以哈桑为契机,对后现代文论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加以审视与开掘。在如火如荼的后现代研究中,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哈桑是引领潮流的人物,他最早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转向”投注热情,并试图从主体、文本、语言、叙述、修辞、批评、阐释、风格、文学史等文艺理论中最具典范性意义的命题切入,对后现代精神在文学、艺术、文化中的生成路径和表现形态加以全方位考察。虽然在种种“前卫理论”争奇斗艳的当下,哈桑的学术贡献似乎已不甚醒目,但无可否认,正是他对后现代文论中诸多原发性概念的梳理与辨析,为接踵而至的拓展性研究做出了坚实的理论铺垫。鉴于此,《“沉默”与“多元”》一书并未执着于对单个思想家的评述,而是将哈桑设定为一面理论视窗,从中窥探“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分期”“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后现代主义的文体实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策略”这些在西方后现代谱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和枢纽价值的重要议题。上述理论尝试不仅有助于

勾勒哈桑后现代理论的基本轮廓,同时,也将驱使研究者深入后现代学术话语的原初语境和内在逻辑,并由此而实现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精神取向)的更加立体、完整、充分的理解。

依托对后现代理论中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沉默”与“多元”》一书为当代中国学界的后现代研究带来了启示。众所周知,在当前的学术话语中,“后现代”大多与“激进”“前卫”“叛逆”“分裂”“破坏”等语汇紧密相关,相应地,研究者通常热衷于一些标新立异的“学术达人”或惹人眼球的前沿议题,而忽视了“传统”与“新异”在具体研究中微妙的动态平衡。换言之,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学、艺术场域,“新”“旧”两种立场往往呈现出相互转换、彼此交织的复杂形态。在特定诱因的刺激下,某些富有挑战性和反叛性的观点将横空出世,并引发较大范围内的追捧与热议,而一些不那么“合潮流”的论题则似乎被打入冷宫。但实际上,上述处于“失语”状态的因素绝不会永久缺席,它们一方面充当了隐性的思想积淀,为所谓“学术热点”带来了自我确证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总是不动声色地积蓄能量,一旦时机成熟,便迅速以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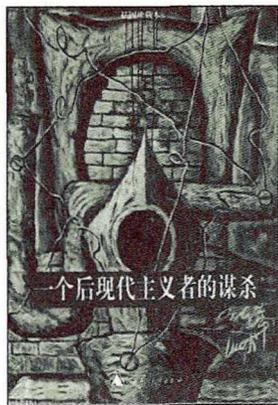
姿态和面貌重新占据公众的视域。正因为如此，在众多新锐学说层出不穷的当代西方文论中，还暗含着一种不断向传统“回溯”的趋向：从作者的“死亡”与“重生”，到阐释的“多元”和“一元”，从文学作为“事件”与“结构”的张力，到文学研究在“政治文化论”和“审美本体论”之间的摇摆，无不为此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象提供了注脚。借助对大量基本理论问题的追溯、探讨与澄清，《“沉默”与“多元”》试图缝合后现代研究在“新一旧”两极之间所存在的裂隙。作者试图强调，任何看似古旧、过时的范畴都不应被轻易抛入“故纸堆”中，相反，有必须要结合当下文化语境而对其加以新的理论建构和价值输入。在沉湎于追逐西方新潮，甚至不惜天马行空、削足适履的中国学术界，《“沉默”与“多元”》无疑暗示了一条足资借鉴的方法论路径。

《“沉默”与“多元”》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对“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这一哈桑理论中的经典命题加以深入解析，从而有效推进了学界对后现代“不确定性”的思考与探究。在当代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等在内的急剧变迁，不仅使分裂

与动荡成了常态，同时也触发了人们对一种流变不居的不确定感受的心驰神往。反映在学术领域，无论是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消解，还是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审判，无论是德勒兹对“精神分裂”状态的构想，还是瓦蒂莫（Gianni Vattimo）对文学、艺术、文化中“虚无主义”倾向的礼赞，无不从理论家各自的视点和学术积淀出发，将不确定性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最显著精神坐标。在《“沉默”与“多元”》这部以后现代为论题的作品中，不确定性自然是无法回避的对象，但作者并未跟风主流学术话语，而是以哈桑最具原创性的“不确定内在性”概念为轴心，由此而展现自己对后现代不确定性的独到见解。在哈桑的理论体系中，“不确定内在性”由“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这两个范畴嫁接而成。哈桑曾谈道，不确定性“充满了力图瓦解（分散、解构、切断连续性）事物的意志和力图整合事物的意志之间的空间”，<sup>[1]</sup>而内在性则昭示了当代人对支离破碎的不确定景观的接纳、包容和主动顺应，“它已经毫无形上意味地变成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不断扩张的符号系统的性质”。<sup>[1]127</sup>承接哈桑的思路，《“沉默”与“多元”》一

书指出，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实际上构成了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透过两者的转换与交互作用，“我们看到疯狂解构意志下潜藏的一种创造力量，这是人的心智中固有的、内在的、充满活力的力量”。<sup>[2]</sup>按照作者的看法，不确定性并非对一切本源、中心、价值和意义的摧毁，亦不能简单等同于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式的无政府主义作风，而是必须经受主体的选择、吸收与认同，并不断被整合到一个独立、稳定、自足的精神结构之中。换言之，在后现代语境下，不确定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确定性”（determinacy）的土壤，并终将依凭某种确定性的姿态而得以具体化和彰显。

基于对“不确定内在性”的反复追问，《“沉默”与“多元”》一书指向了当代文艺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理论研究所存在的症候。即是说，研究者一方面意识到不确定性在后现代语境下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时常过度夸大后现代精神对一切确定性因素的冲击、扫荡和瓦解。当这样的倾向被演绎到极致时，便只会导致规范的残缺和共识的陨落，并连带引发真理、价值、信仰，乃至整个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沦丧。对于上述危险倾向，不少西方



知识分子已做出了睿智的回应。如美国学者伯格（Arthur A. Berger）在学术荒诞小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位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的教授在家中被人同时用四种方法杀死，而警方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人杀死他。正是借助这一看似荒唐透顶的场景，伯格向人们展示了后现代不确定性在现实经验的频频拷问下所现出的窘态。<sup>[3]</sup>由此出发，《“沉默”与“多元”》对“不确定内在性”的阐发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作者试图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片多元、驳杂、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场域，其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处于交织、杂糅、互为前提的暧昧状态，共同折射了文艺理论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思想转折和话语变迁。上述见解不仅丰富了当前后现代研究的智识储备，同时也无疑传达出鲜明的批判立场与严肃的现实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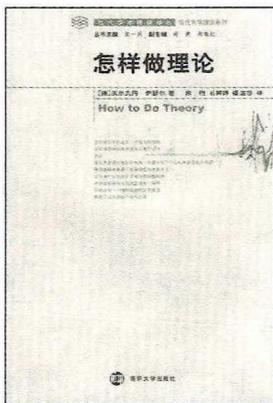
除去学理层面的锐意开拓，《“沉默”与“多元”》一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坚持以文本为旨归，借助具体、直观的文本经验来印证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有学者从词源学出发，指出“理论”（theory）一词的产生可追溯至古希腊动词“看”（theatai），而后者又充当了名词“剧场”（theatre）的词根。故而，自诞生伊始，理论便包含着明显的“观察性”潜质，并始终与生动、丰富的经验事实保持着难以割裂的血肉关联。<sup>[4]</sup> 理论的观察性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可以说，文艺理论的最重要使命之一，便在于通过对各色文本的深度耕犁，将“形而下”的感受与体验升华为“形而上”的追问与沉思，并最终打破接受者的种种常识、惯习与“刻板印象”，得出具有穿透力和创造性的结论。然而，理论与文本的亲缘性在当代文艺理论中遭到了极大削弱。具体说来，研究者往往立足于各自的社会、政治、文化诉求，试图从文本中寻觅自己先行设定的答案。这样的理论姿态



在引发批判效应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具体文本经验的割裂与肢解，并不免暴露出“观念先行”和“自说自话”的症候。<sup>[5]</sup> 相较之下，《“沉默”与“多元”》展现出更加稳健而均衡的研究姿态。虽然该书聚焦于一系列颇具学理性的论题，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又不忘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不断从斑斓杂陈的后现代文本中萃取闪烁着智性光芒的精神内涵。在第二章《后现代性的预言》中，作者结合哈桑对乔伊斯（James Joyce）名作《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解读，揭示了后现代文学在语言表述、文本结构、修辞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风貌。在第三章《“沉默的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先行者》中，作者同样跟随哈桑的脚步，对西方先锋派文学加以

全面、细致的考察，进而提出，后现代文学、艺术、文化往往以刻意为之的“沉默”姿态得以显现，这种沉默并非一味的离经叛道，而是要“向西方文明的种种根本假设和价值观念发起挑战”，并最终导向了“对一个彻底解放的神话的展望”。<sup>[2]175</sup>在第四章《后现代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中，作者更是依托哈桑对卡夫卡（Franz Kafka）、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巴斯（John Barth）、凯奇（John Cage）、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等人作品的个性化诠释，揭示了后现代精神所孕育的，以“超越形式主义批评的藩篱，追寻意义和价值产生的终极源泉”<sup>[2]247</sup>为己任的“超批评”（Paracriticism）模式。依凭上述层层深入的文本勘探，在《“沉默”与“多元”》一书中，对后现代的讨论不再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操演，亦不再是承载研究者一己之见的载体或工具，而是立足于更加坚实、稳固的精神根基。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沉默”与“多元”》还建构了一种“多元对话”的独特学术格局。毋庸置疑，人文科学的重要标志，在于视点的发散性、思维的开放性以及解读的无限丰富性。如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便谈道，自然科学相



信，“只有一个解答，或者只有一个最好的解答”；人文科学的思考则具有动态、灵活、流变的鲜明特征，其研究结论更近似“一个不适于运用排中律的较综合的成果”。<sup>[6]</sup>伊瑟尔（Wolfgang Iser）指出，自然科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硬理论”（hard-core theory），它试图通过条分缕析的操作而推导出稳固的、可预测的法则；人文科学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软理论”（soft theory），它“既不

存在客观的也不存在可衡量的参照标准”，<sup>[7]</sup>因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并终将造成不同理论之间激烈竞争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在人文科学领域，一种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强调的“对话”（dialogue）便显得尤为重要。即是说，人文知识分子切不可局限于刻板、凝滞的“独白式”写作，而应当尽可能呈现“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sup>[8]</sup>无可否认，在围绕西方文艺理论的国内研究中，单一、同质的独白式话语依然占据主位。换言之，研究者多半满足于对既有理论的一般化介绍，很少能形成不同观点、态度、立场的呼应与共鸣。相较于同类研究，《“沉默”与“多元”》在方法论层面的一大优长，便在于对“多声部”对话状态的渲染与营造。稍加留心即可发现，在该文本的字里行间，作者至少融入了三种相对独立的声音。第一，是研究对象的声音，亦即对哈桑本人后现代思想的介绍与评述。其中既包括历时层面的学术史梳理，也包括共时层面的理论开掘和概念辨析，同时还包括对哈桑理论言说的“原汁原味”的征引。<sup>[9]</sup>第二，是其他相关理论家的声音，亦即与哈桑同时期的众多研究者针对后现代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如贝尔（Daniel Bell）

的“新保守主义”考察，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利奥塔的“后结构主义”探究，罗蒂（Richard Rorty）的“新实用主义”追问，等等，上述研究与哈桑的观点形成了相互印证与阐发的可能。第三，是研究者自己的声音。《“沉默”与“多元”》一书并未满足于“就哈桑而言哈桑”的空泛，而是引入了作者本人的敏锐观察与批判性反思。作者坚信，尽管哈桑的批评观念并非毫无瑕疵，也无法适用于对所有后现代文学、艺术现象的解读，但蕴含其中的“怀疑精神、否定精神和批判精神”<sup>[2]260</sup>却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语境下获取更广阔的生长空间。正是上述多种声音的并存，将哈桑置于一张由复杂理论节点编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从而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深入《“沉默”与“多元”》的字里行间，并与之碰撞出更耀眼的思想火花。

综上所述，通过对“传统—新锐”“确定性—不确定性”等理论取向的斡旋与缝合，对纷繁驳杂的文本经验的沉潜体悟与悉心勘探，以及对一种“众声喧哗”的对话格局的烘托与营造，《“沉默”与“多元”》一书展现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当然，作为一部探究性、尝试性的学术论著，在该

书中同样存在着一些令人意犹未尽之处，如研究者对哈桑后现代理论与“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之内在关联的阐发还不够充分，对哈桑后现代思想在中国文论“现代化转换”中的意义虽有所提及，但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等等。然而，无论如何，在绚烂夺目的后现代“理论星丛”中，《“沉默”与“多元”》都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思想片段，一个难能可贵的起点和契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阐释的边界’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估研究”（项目编号：18CZW006）的阶段性成果。]

#### 注释

[1] [美] 伊哈布·哈桑. 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 [M]. 刘象愚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110.

[2] 毛娟. “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1.

[3] 参见 [美] 阿瑟·A. 伯格.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 [M]. 洪洁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周宪. 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2015（4）：137—146.

[5] 如英国学者沃尔弗雷斯曾列举

了散居族裔批评、性别及跨性别批评、有色女性及女性主义批评、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及批评、伦理批评、创伤及证词批评、生态批评、空间批评、网络批评、幽灵批评、（超）物质批评等盛行于21世纪的批评风尚。上述理论派别虽然在“空间位置”上相近，但固守各自的“元话语”和方法论视域，缺乏对经验事实关注、开掘与提炼，因而也常常各自为政，难以产生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参见 [英] 朱利安·沃尔弗雷斯. 21世纪批评述介 [M]. 张琼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 [美]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 [M]. 范岱年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8.

[7]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 怎样做理论 [M]. 朱刚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7.

[8] [俄]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A]. 白春仁等译. 钱中文.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

[9] 在研究的推进过程中，作者曾通过书信等方式与哈桑取得联系，并由此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上述尝试无疑将增强本书中哈桑声音的确切性和可信性。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